

# 浅析婺源古建筑“三雕”兴盛的原因

The Cause of "Three Carvings" of Wuyuan Ancient Architecture Flourishing

文 / 陈道龙 王飞凯

婺源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此地唐五代属歙州，宋属徽州，明、清是徽州所辖县之一，1949年以县划归江西。婺源在汉代以前是古山越人居住之地，东晋时期大量中原望族为躲避战乱南迁至此，择地相土以宗族聚居的方式定居下来。尽管历经数百年的变迁，婺源至今仍保存着一幢幢完整的明清时代的古建筑。在这些古建筑中，一个鲜明的特征便是砖、木、石雕作为装饰与建筑巧妙融合。人们将这些技艺高超、工艺精湛、气韵生动、自成一体的建筑雕刻艺术统称为“三雕”。“三雕”几乎遍饰在婺源古建筑的每一个角落，众多的牌楼、牌坊，民居中的门楣屋檐均饰以精美的石雕、砖雕，层层相叠，不胜其繁。宅内则木雕梁栋，天井周围的落地隔扇、莲花门、窗台栏板、阁楼挂络，斗拱雀替、华板柱棋上更是雕花缀朵琳琅满目，细致绝伦。

婺源古建筑“三雕”艺术如此丰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富室显荣

“婺居徽饶间，山多田少。西南稍旷衍。东北多依山麓垦以为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牛犊不得耨其间，刀耕火种，仰泽于天”<sup>①</sup>的地理环境，迫使众多婺源人不得不“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sup>②</sup>从而形成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明代中期以后，这些商贾开始驰骋于中国商场，其行踪遍布全国，财力大增。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描写“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销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商贾们外出致富后，大多回家“盛馆舍以广招宾客，扩祠堂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显荣”，<sup>③</sup>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婺源古建筑的发展。

婺源是宋代大儒、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一直“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sup>④</sup>“非朱子传义不敢言，非朱子家礼不敢行”。<sup>⑤</sup>受此风气的影响，婺源商贾们“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sup>⑥</sup>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立身行事之本。他们遵循传统，不张扬、讲内涵，在古建筑的装饰上选择简练的门庭和奢华的内饰来体现这种特质，这也就刺激了建筑“三雕”装饰艺术的发展。

## 二、达官尚贵

经商虽然使婺源先民富了起来，但是地位却很低下。明代朱元璋时期就实行了“重农抑商”政策，清雍正朝的《大清会典》更明确指出“四民以士为长，农次之，工商其下”。商贾的地位居四民之末，为士人所不齿，在这种“贱商”的社会风气面前，婺源商人洪庭梅就感慨说“今庶几为所欲为，奚仆仆风尘以商贾自秽”。<sup>⑦</sup>所以，这些商贾告诫后人“毋效贾竖子为也”、“继志莫如读书”。加之受传统儒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婺源人认为“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无以显亲”，由此形成了“号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书声震屋”、“苦读勤耕”的景象。明、清两代，婺源中举入仕者，“一邑当他省之半”，更有“一门四进士，六部四尚书”的奇迹。

这些官宦衣锦还乡，大兴土木修建宅第，婺源至今仍存的“尚书第”、“大夫第”、“司马第”、“进士第”等就是历史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官宦们行走五湖四海的阅历，提高了对自然美和建筑美组合空间的审美要求，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文化素养、审美趣味，对建筑和“三雕”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在建筑规模上向其内在“三雕”艺术方面扩展。

## 三、艺术繁荣

婺源的龙尾砚在明清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文房珍宝。大批雕砚的

能工巧匠，对“三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加上明末清初崛起的新安画派和徽派篆刻等艺术也在无形中对“三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出版史上独占鳌头的徽州版画和徽州刻书更造就了一批刀头具眼、指节通灵的镌刻高手，这又直接丰富了“三雕”工艺的技巧。这些艺术与“三雕”息息相关、相互借鉴、同步发展，对“三雕”艺术技法的提高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

## 四、建材丰足

“山林之利，我婺独擅”<sup>⑧</sup>的天然条件，致使婺源木材价廉，屋庐之制“自栋梁以至器用小物，无不需之”。<sup>⑨</sup>这就决定了婺源建筑的木结构体系，也为木雕梁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婺源因居山国，石材资源丰富，盛产优质青石。这种石料质地坚柔润泽、纹理细密、光泽优良，既是坚固的建筑材料，又是适于雕琢的良材，因而被广泛用于牌坊和牌楼装饰。

## 五、雕工艺巧

作为民间艺术，婺源“三雕”工艺匠师多是当地的手工艺人。丛山环峙、山多田少的生存环境，迫使婺源“小民多执技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双巧手开辟生存新天地。有谚云：“买田买地，不如学个手艺。”民风如是，造就了婺源工艺繁盛的良好氛围。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的地方经济，不仅为“三雕”的繁盛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刺激了婺源工艺的发展。黄宾虹就指出“富商显宦，邻里相望，以故百艺工巧”。<sup>⑩</sup>婺源民风崇儒尚文，文化底蕴深厚，这种“郁郁乎文哉”的气氛，使得“多执技艺”的婺源“巧工”们在潜移默化之中智窍大开，而“学技必先学文”<sup>⑪</sup>的传统，使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作是艺术品，是可珍重的”，“故决不出之以轻心”，“全部不肯苟简潦草地从事”，<sup>⑫</sup>“艺能日进，片长薄技，新巧相向，争自揣摩，期于尽善”，<sup>⑬</sup>外来文化和各地域文化的吐纳融会，又使婺源各类“巧工”打开了眼界，有了广博学习借鉴的机会。诸多因素的汇合，终于造就了“雕工随处有之，徽州最盛亦最巧”<sup>⑭</sup>的兴旺局面。

从以上分析可知，婺源古建筑“三雕”作为一种民间传统工艺，它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婺源强大的经济实力提供了“三雕”的生长土壤，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了“三雕”的思想内涵，繁荣的艺术形式提高了“三雕”的表现技法，富饶的工艺材料保障了“三雕”的物质基础，淳朴的能工巧匠保证了“三雕”的完美体现，严格的等级制度决定了“三雕”是婺源古建筑的必然选择。

### 注释：

- ①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婺源县志.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16页
- ②⑥戴震全书之三十二·戴节妇家传,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549,553页
- ③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
- ④(清)雍正.茗洲吴氏家典·序,卷1,家规
- ⑤(清)道光.休宁县志·艺文.道光三年(1823年)
- ⑦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七.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金陵刻本
- ⑧(清)光绪.婺源县志.风俗,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
- ⑨(清)陶朱公.增补陶朱公致富全书,卷一.同治二年(1863年)刊本
- 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四部丛刊三编本.20页
- ⑪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88,页
- ⑫李渔.李渔全集,第十一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43页
- ⑬黄宾虹.黄宾虹文集.杂著编.金石篇.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 ⑭(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二十.中华书局,1979年
- ⑮(战国)荀况著 牟瑞平译注.荀子.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260页